

唐代屈騷接受史論略

蔣方

(湖北大學文學院)

三百年的大唐王朝，是繼漢之後的又一個統一而強盛的國家。屈原及其作品的傳播與接受，經過漢人的熱情奠基，經過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相對沈寂，在唐代又呈興盛之勢。大體而言，唐人對屈騷的接受向度有三：一是對屈原其人的理解與闡釋；二是對屈原作品的理解與闡釋；三是對與屈原相關的端午節俗的理解與闡釋。唐代的端午節俗，另有探討，本文則集中討論屈原及其作品在唐代的接受狀況，因以“屈騷”二字概括。

唐承隋後，結束了長期的動亂與分裂，建國之初，即很重視文化建設，從意識形態上強化統一政權的力量。唐太宗李世民在這一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如修前朝之史，勘定《五經》文本，編寫《五經正義》。這時的宮廷文藝，延續著梁陳的風氣，吟風月，弄花草，太宗本人就有《詠風》《詠雨》《詠雪》一類詩作。不過，太宗及其臣屬，多是由創業的路上過來，對於朝政，既有著深重的憂患意識，又充滿振奮有為的精神氣質，因此在思想感情上與屈原那憂愁幽思以求報國的情感有所相通，讀屈原之作，對其品格與遭遇多持肯定與同情。

如李世民搜檢史事作《金鏡》，為的是“睹治亂之本源，足為明鏡之鑒戒”，其中引孔子之語：“子從令者不得為孝，臣苟順者不得為忠”，強調君主要能自警明辨，臣下要能忠不懼危，曰：“子身而執節，孤直而自毀，屈原是也；外顯和睦之端，內懷湯火之意，辛誣是也，忠諫之道，以此觀之，足為永鑒。”^[1]魏徵作《論君子小人疏》，謂“小人非無小善，君子非無小過”，勸戒太宗勿惡君子之小過而取小人之小善，“此則蒿蘭同嗅，玉石不分，屈原所以沈江，汴和所以泣血者也。”^[2]這裏談到的屈原行為之偏激問題，早在漢代，就有批評者，如揚雄，如班固，魏晉以後，指責更甚，如劉獻之斥屈原“自是狂人，死其宜矣”^[3]，如顏之推以屈原為輕薄，責其“露才揚己，顯暴君過”（《顏氏家訓·文章》）。而李世民與魏徵談屈原，不回避前人的指責，提出“衆之所謂賢，未必盡善，衆之所謂毀，未必全惡”（《金鏡》），認為屈原的沈江自毀，實乃賢臣君子之忠心懇切之至，做君主者不可以不明鑒，不可以不引以為教訓。李世民與魏徵對屈原貞剛品格的表彰，對屈原投江自沈的同情，基本上是自漢以來的公論，但他們對屈原沈江自殺的理解，則超出前人的局限，體現出開國君臣的氣度與識見。劉知幾《史通·載文》云：“文之為用，遠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載于周詩；懷、襄不道，其惡存乎楚賦。讀者不以吉甫、奚斯為諂，屈平、宋玉為謗者，何也？蓋不虛美、不隱惡故也。”^[4]雖然以史視文未免僵硬，但劉知幾用“不隱惡”來稱讚屈原的“顯暴君過”，並不責其“露才揚己”，與太宗、魏徵的理解相通。這是初唐時期屈騷接受中值得關注的現象。

這一時期人談及屈原的創作，基本上承繼南朝人的看法，以屈騷為文士文學之源。如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云：“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英辭

潤金石，高義薄雲天。自茲以降，情志愈廣。”如裴子野《雕蟲論》在標舉《詩經》“王化之道”後說：“後之作者，思存枝葉，繁華蘊藻，用以自通。若夫悱惻芳菲，楚騷爲之祖；靡漫容與，相如扣其音。由是隨聲逐影之儔，棄指歸而無執。”唐人承之，初唐時，類似的議論頗爲多見，如魏徵主持撰寫的《隋書·經籍志》就說：“自靈均已降，屬文之士衆矣”；令狐德棻等撰《周書·王褒庾信傳論》稱“兩周道喪”，諸子蜂起，“其後逐臣屈平，作《離騷》以敘志，宏才艷發，有惻隱之美。宋玉，南國詞人，追逸轡而亞其迹”；姚思廉《陳書·文學傳論》曰：“《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曰：煥乎其有文章也。自楚、漢以降，辭人世出，洛汭、江左，其流彌暢”。沈約等以屈騷爲文士文學之先，反映了《詩經》之後明著姓名的文人文學發展的歷史，故唐人論史，多主其說。而屈騷的華美文辭與南朝侈麗流靡的文風取尚有著面貌上的聯繫，裴子野的批評就是因此而發，故當唐人反對南朝流靡文風之際，批評屈騷的聲音就變得響亮起來。

這種批評出現于高宗以後，以四傑爲代表，態度相當嚴厲。如王勃曰：“自微言既絕，斯文不振。屈、宋導澆源於前，枚、馬張淫風於後。談人主者，以宮室苑囿爲雄，敘名流者，以沈酗驕奢爲達，故魏文用之而中國衰，宋武貴之而江東亂。”^[5]王勃將文章華美與國家破亡聯繫到一起，言辭激憤偏頗，有加強效果之意，不可太當真，但他視屈騷爲“澆源”，正是上承裴子野“悱惻芳菲，楚騷爲之祖”的觀點，言而有據，的確是他的認識。而楊炯、盧照齡、盧藏用等都有類似的議論，可見這并非王勃的一時之言。引人注意的是，這些批評屈騷的議論，往往先擡出孔子而區分儒與文：楊炯說：“仲尼既沒，遊、夏光洙泗之風；屈平自沈，唐、宋弘汨羅之迹。文儒於焉異術，詞賦所以殊源。”^[6]盧照齡說：“昔文王既沒，道不在於茲乎！尼父克生，禮盡歸於是矣。其後荀卿、孟子，服儒者之褒衣，屈平、宋玉，弄詞人之柔翰。禮樂之道，已顛墜於斯文；雅頌之風，猶綿連于季葉。”^[7]盧藏用說：“昔孔宣父以天縱之才自衛返魯，乃刪《詩》《書》，述《易》道而修《春秋》，數千百年，文章粲然可觀也。孔子歿二百歲而騷人作，於是婉麗浮侈之法行焉。”^[8]以儒、文爲分別，蕭繹已言之：“古之學者有二，……夫子門徒，轉相師受，通聖人之經者，謂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長卿之徒，止於辭賦，則謂之文。”（《金樓子·立言》）蕭繹的分別，是在學術與文學，故一爲“通聖人之經”，一爲“止於辭賦”。但王勃楊炯等卻不同。他們以孔門爲文學之源，謂孔子“文章粲然可觀”，謂“遊、夏光洙泗之風”，已經改變了上述魏徵等初唐時人的看法，以聖人經典爲文士文學的發源，賦予文士文學以更崇高、更重要的意義。因此，在他們眼中，屈騷之華美芬芳，不但開後世侈麗之風，而且中斷了孔門儒家的文學傳統，故要大加撻伐，其言辭之激烈，也就不足爲怪了。

王勃等如此嚴厲地批評屈騷，是與他們所倡導的詩風革新密切相關。繼之的玄宗時代，被譽爲詩歌的盛世，“諸公之詩，如顏魯公書，既筆力雄壯，又氣象渾厚”（嚴羽《答吳景仙書》）。隨著詩歌風貌的健康成熟，初唐時期的變革呼聲完成了歷史使命，這時的論詩者，多品賞，少批評，對屈騷的議論也明顯減少。但王勃等人對屈騷中斷孔門文學傳統的批評始終存有影響。如李白《古風》之一：“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以“正聲”相對於以“哀怨”爲特色的屈騷，有失路歎惜之意。如署名王昌齡的《詩格·文意》稱：“夫子傳于遊、夏，遊、夏傳于荀卿、孟軻，方有四言、五言效古而作。荀、孟傳於司馬遷，遷傳于賈誼。誼謫居長沙，遂不得志，風土既殊，遷逐怨上，屬物比興，少於風雅。複有騷人之作，皆有怨刺，失于本宗。”^[9]這段文字有明顯的訛誤，但以子遊、子夏爲孔門文學的傳人，以屈原、賈誼之作“少於風雅”，故“失于本宗”，這些表述卻是清楚的，也與王勃等人的觀點一脈相承。這種論點，在中唐散文革新運動興起之時也常常見到，而且鋒芒更銳。

還在玄宗天寶年間，士人中已有復古求變的呼聲，安史亂後，復古求變的思潮更與中興大唐的

政治訴求相聯繫，成為中唐社會的一種思想力量，投射到文學上就有散文的革新運動與新樂府的提倡。而面對專制王朝，士人之憂國憂政，越投入，就越是感覺打擊沈重。德宗時朝政的腐化，順宗時政治革新的失敗，憲宗以後權勢鬥爭的日趨激化，使許多熱情報國、期待中興的士人對朝政日趨失望，而不得不調整自己的人生態度。這些社會思潮、政治動向與士人心態，都對這一時期的屈騷接受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韓愈和柳宗元，是中唐散文革新運動的領袖和中堅。在他們之前，有蕭穎士、李華、獨孤及、賈至等一批有志之士呼籲恢復古道，開韓柳“文以載道”之文體、文風變革的先聲。在李華等先驅者的議論中，如同王勃等倡導詩風革新時的議論，屈騷也受到嚴厲的批評。李華說：“夫子之文章，偃、商傳焉。偃、商歿而孔伋、孟軻作，蓋六經之遺也。屈平、宋玉，哀而傷，靡而不返，六經之道遁矣。”^[10]他轉述蕭穎士的看法說：“君以為六經之後有屈原、宋玉，文甚雅壯而不能經。”^[11]以孔門文學為經典而批評屈騷中斷了傳統，蕭穎士、李華可以說是上承了王勃等人的看法，但是，在屈騷所中斷的傳統內涵上，蕭李的批評則從區別質樸與華美的文風而進入到文章的精神內核。他們肯定了屈騷文章的“雅壯”，卻指責屈騷“不經”，因為其“哀而傷，靡而不返”。即謂屈騷之情感哀怨過度，屈騷之文辭華美過度，而“夫子之文章，深其致，婉其旨，直而不野，麗而不艷”^[12]，故屈騷起而“六經之道遁矣”。他們的批評，不惟在屈騷之麗辭，更在屈騷之情感與表達，遠比初唐時人的批評嚴重。而這種認為屈騷之哀怨情感有違儒學精神的批評，在當時頗有共鳴，如崔佑輔《穆氏四子講藝記》：“屈原、宋玉，怨刺比興之詞，深而失中，近于子夏所謂哀以思”^[13]；柳冕《與徐給事論文書》：“自屈宋以降，為文者本於哀艷，務於恢誕，亡於比興，失古義矣”^[14]；裴度《寄李翱書》：“騷人之文，發憤之文也，雅多自賢，頗有狂態。”^[15]這些對屈騷的批評，貫穿著惟儒學道統是舉的宗旨，而忽略了散文自身的表達藝術。這是散文革新運動早期的特點，而待韓愈、柳宗元出，情況發生了變化。

韓、柳繼續著前人“文以載道”的宗旨，而在“載道”之文上下著大功夫。他們主張以古文復古道，在批評駢儷文體的同時，著力於新文體的建設。在提倡散行單句之秦漢古文的同時，又著力探討文章之藝術，強調要廣泛學習前代文章之精華，因而對於屈騷，提出了完全不同於前代革新者的看法。首先，他們以屈原為文章豪傑之士。韓愈批評時下文章說：“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楊雄之徒進於是選，必知其懷慚乃不自進而已耳。”^[16]他以屈原為博學宏辭之士而懷慚今日，來譏諷當世文章的徒事雕繪，對屈騷則有全面的肯定。柳宗元有《吊屈原文》^[17]，不僅推尊其人之“惟道是就”，“服道以守義”，而且對屈騷充滿景仰：“先生之貌不可得兮，猶仿佛其文章，託遺編而歎喟兮，渙餘涕之盈眶。”他擬《天問》而作《天對》，又作騷體十篇，斥讒巧，罵屍蟲，以泄憤懣，對屈原之文格外青睞。第二，他們充分肯定了屈騷的哀怨情感。韓愈聲稱：“居窮守約，亦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以求知於天下，亦不悖於教化。”^[18]認為窮愁文人之抒寫怨悱，本是文章的功用之一，即使有“奇怪”過度之詞，也不背六經之旨。故當他提出“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的著名論點時，就稱：“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非但不以屈原之怨懟為“不經”，“失中”，還視其為衰世之“善鳴者”，與“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相提並論。柳宗元更是以屈原之哀怨自比，過汨羅而吊屈原，惺惺相惜，訴說自身之遭遇，則曰“哀如屈原”^[19]，將幽怨情感視為屈騷之特徵而教人作文要“參之《離騷》以致其幽”^[20]。第三，他們充分肯定了屈騷的文辭。韓愈和柳宗元在論學習為文時，都主張要博取眾家之長，“沈浸醞鬱，含英咀華”。他們所舉出的眾家之中，不但有屈騷，而且往往將《莊》《騷》并舉，如韓愈《進學解》：“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21]；如柳宗元《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大都文以行為本，在先誠其中。其外者當先讀六經，次《論語》、孟軻書，皆經言；《左氏》、《國語》、莊周、屈原之辭，稍採取之”^[22]這樣的提法，顯然是認為《莊》《騷》在風貌上有相近處，而讚美其文辭，以為學

習的樣本。韓柳全面肯定屈原及其創作，一改前人對屈騷之華美文辭與怨憤情感的批評，他們的看法對後人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這一時期對屈原其人的文學接受，主要從兩個方向展開，一是經由其地者的吊屈思古之作，一是仕途坎坷者的感憤抒懷之作。唐代的流貶者多往南方，而無論嶺南還是西南，從長安出發，都要過荊湘——屈原故地。這些遷人逐臣，面對貶謫流放，往往將自己的命運與屈原相聯繫，尚未出發，已有“湘靈”之歎，身處沅湘，更有“秋風”之悲，而出京外仕者在經過沅湘時也難免漂泊之感而聯想屈原，喚起共鳴，故而這一時期的吊屈謁廟之作，數量可觀。文如柳宗元的《吊屈原文》、蔣防《汨羅廟記》、王茂元《楚三閭大夫屈先生祠堂銘》，詩如竇常《謁三閭廟》、戴叔倫《過三閭廟》、皎然《吊靈均詞》、孟郊《旅次湘沅有懷靈均》等，都從同情屈原之不遇而批評朝政的昏沈，表彰屈原之忠貞而寄託自己的不平。另有一些作者，也因仕宦挫折而議論屈原，但與身臨其地者有不同，他們集中論說的是個人與社會的調適關係，而少見忠貞剛直等傳統的道德表彰。他們從《楚辭·漁父》中拈出“衆人皆醉我獨醒”之“獨醒”二字，代表屈原的人生態度，藉以表達自己在困蹇中的思考。如劉長卿：“獨醒空取笑，直道不容身。”（《負謫後登幹越亭作》）錢起：“憔悴異靈均，非讒作逐臣。如逢漁父問，未是獨醒人。”（《江行》）白居易：“楚王疑忠臣，江南放屈平。晉朝輕高士，林下棄劉伶。一人常獨醉，一人常獨醒。醒者多苦志，醉者多歡情。”（《效陶潛體詩十六首》）盧同：“假如屈原醒，其奈一國醉。一國醉號呶，一人行清高。便欲激頹波，此事真徒勞。”（《感古》）柳宗元：“無限居人送獨醒，可憐寂寞到長亭。”（《離觴不醉至驛寄相送諸公》）韓愈：“屈原離騷二十五，不宜哺啜糟與醢。惜哉此子巧言語，不到聖處寧非癡？”（《感春》）這些，看似批評屈原的偏執，實乃政治態度的自我調整，表達了中唐士人在中興理想破滅之後而不得不作退縮時的失望與悲憤。

中唐時期的屈騷接受，與現實的關係密切而複雜，內涵也頗為深刻。韓愈、柳宗元為推動古文復興而重新評價屈騷，消除前代文學革新者加給屈騷的惡評，深化了人們對屈騷的情感與文辭的認識。而當這些復古中興思潮的弄潮者在政治上遭遇挫敗時，他們借屈原的遭遇來抒寫憤懣，更借屈原的遭遇來思考人生，從政治追求與個人生活的不同層面來闡釋屈原，使屈原及其創作的意義在文學接受活動中變得更加豐富。

三

唐文宗以後，藩鎮割據已成事實，嚴重削弱中央權力，而朝廷內部，朝官與宦官的鬥爭，朝官內黨派之間的鬥爭，卻又越演越烈，朝政一片淆亂。唐王朝就如同將傾的大廈，穿風漏雨，搖搖欲墜。在這種情勢中，屈原那憂國傷亡的忠貞，被讒放流的怨憤，孤高不俗的執著，成為了這一時期屈騷接受的主題。這些對於屈原的道德表彰，是自漢以來的屈騷閱讀中已經廣為接受的觀點，而在晚唐時期重新成為熱論，不僅具有晚唐的時代特色，而且還有新的開掘。

漢代士人往往借屈原的忠而被讒來抒寫自己的不遇之怨，如賈誼、揚雄、劉向等。而晚唐士人往往借屈原來作政治批評。文宗時，權勢紛爭而發生的一系列事件，如宋申錫的貶逐而死，李德裕的外放，李宗閔的貶出，李甘的貶謫而死，震動朝野，引起士人的感憤。雖然其中不無黨爭排異，但在當時人眼中卻一律視作忠奸鬥爭，因而他們往往舉屈原為類，抒寫自己的不平。如許渾《太和初靖恭裏感事》：“清湘吊屈原，垂淚擷萍蘩。謗起乘軒鶴，機沈在檻猿。乾坤三事貴，華夏一夫冤。甯有唐虞世，心知不為言。”^[23]將宋申錫比作忠懇為國而被讒沈江的屈原。如杜牧《李甘詩》，在敘述李甘忠貞被貶的事跡之後，引屈原為讚頌：“幽蘭思楚澤，恨水啼湘渚。恍恍三閭魂，悠悠一千古。”^[24]它如許渾為李德裕而作《寄郴州李相公》，李商隱為貶謫而死的蕭瀚作《哭遂州蕭侍郎》，曹

鄴爲李甘而作《續幽憤》，都將屈原作爲忠貞不阿之朝臣的象徵，在讚頌的同時抨擊時政。

漢代士人往往以屈原與靳尚對比，代表忠臣與奸佞的褒貶，或與伍子胥并舉，以突出被讒沈江的冤屈。晚唐時期，士人檢討歷史而思考現實，出現大量的詠史懷古之作，屈原是這種歷史思考的焦點之一。這些作品，從不同角度抒寫作者心中的屈原，其意義不止於忠奸鬥爭或君臣際遇，更與民族、國家之存亡相聯繫，表達對於現實的焦灼心情。如杜牧《題武關》：“碧溪留我武關東，一笑懷王迹自窮。鄭袖嬌嬈酣似醉，屈原憔悴去如蓬。”^[25]如胡曾《武關》：“戰國相持竟不休，武關才掩楚王憂。出門若取靈均語，豈作咸陽一死囚。”^[26]將懷王囚秦、楚國滅亡與拒納屈原之諫聯繫起來作因果分析，以警告唐朝君主。如汪遵《三閭廟》：“爲嫌朝野盡陶陶，不覺官高怨亦高。憔悴莫酬漁父笑，浪教千載詠《離騷》。”^[27]周曇《屈原》：“滿朝皆醉不容醒，衆濁如何擬獨清。江上流人真浪死，誰知浸潤誤深誠。”^[28]則痛惜屈原雖死而不能驚醒沈醉昏庸的滿朝君臣，詩稱“浪教”“浪死”，言鋒直指現實。屈原之獨醒，曾是士人藉以調整自我、退避政治的話頭，在晚唐，則成爲關心國事者的一片憂慮。如杜牧《贈漁父》：“自說孤舟寒水畔，不曾逢著獨醒人。”^[29]無獨醒者，即無憂國憂民者，言外有無限沈痛。屈原之忠君，前人言之最多，晚唐則出現了以屈原爲愛國的看法。崔塗《屈原廟》：“讒勝禍難防，沈冤信可傷。本圖安楚國，不是怨懷王。”^[30]已有區分國家與君主之意，羅隱作《三閭大夫意》則特別分辨道：“原出自楚而又仕懷王朝，雖放逐江湖間，未必有腹江魚意。及發憔悴，述離騷，非所以願望逗留，抑由禮樂去楚，不得不悲吟歎息。夫禮樂不在朝廷，則在山野。苟有合乎道者，則楚之政未亡，楚之靈未去。原在朝有秉忠履直之過，是上無禮矣；在野有揚波歌謔之難，是下無禮矣。朝無禮樂則證諸野，野無禮樂，則楚之政不歸，楚之靈不食。原，忠臣也，楚存，與存，楚亡，與亡，於是乎死。非所怨時也。嗚呼！”^[31]這裏的“禮樂”，失之於朝則求之於野，不僅關乎“楚之政”，更緊系於“楚之靈”，顯然不是儒學周禮的政治涵義，而指楚之民族文化，越出君王政位而代表楚國的歷史存在。其曰“楚存，與存，楚亡，與亡”，堅定有力地指明屈原所殉者，非懷王，而是楚國。這樣的理解與闡釋，包含著深刻的歷史思考和對晚唐社會的批判，借屈原而訴說著一片憂國傷亡之心。正如王魯復《吊靈均》所云：“萬古汨羅深，騷人道不沈。明明唐日月，應見楚臣心。”^[32]

或許正是由於對屈原那憂國傷亡的情感認識，晚唐人將杜甫與屈原聯繫了起來。徐介《耒陽杜工部祠堂》：“手接汨羅水，天心知所存。固教工部死，來伴大夫魂。流落同千古，風騷共一源。消凝傷往事，斜日隱頽垣。”^[33]裴說《經杜工部墳》：“騷人久不出，安得國風清？擬掘孤墳破，重教大雅生。皇天高莫問，白酒恨難平。悵快寒江上，誰人知此情？”^[34]杜甫一生仕運蹇礙，官職低微，本來難與身爲宗族、仕爲左徒的屈原相比，徐介等之產生如此聯想，固然是由於他的葬地耒陽，近于汨羅。而更重要的是，杜甫那“窮年憂黎元，歎息腸中熱”的詩歌精神，與屈騷的“憂愁幽思”相通相合，在晚唐政權風雨漂搖之際，最讓焦心于國事者懷古生情，遂將這二位偉大的孤獨者聯繫到一起：“固教工部死，來伴大夫魂”；“屈原宋玉鄰君處，幾駕青螭緩郁陶”^[35]。徐介的“風騷共一源”，明確地將以質樸爲稱的《詩經》與以艷麗著名的《楚辭》同視爲文學之源，大力肯定屈騷的批判精神。因爲是從批判精神的層面將杜詩與屈騷聯繫到一起，所以裴說才感慨騷人不出，國風不清，大雅不生。這與韓柳的從文采與情感出發，而以屈騷爲文章取法，有所不同。

天佑元年(904)九月二十九日，哀帝有詔封屈原：“楚三閭大夫屈原正直事君，文章飾己。當椒蘭之是佞，俾蕙茝之不香；顯比干之赤心，躡彭咸于綠水。雖楚煙荆雨，隨強魄於故鄉，而福善禍淫，播明靈於巨屏。名早流於竹素，功有蓋於州閭。爰表厥封，用旌良美，宜封爲昭靈侯。”^[36]這一年的元月，朱溫挾持昭宗而遷都洛陽，八月殺昭宗而立哀帝。此詔應禮朗觀察使雷滿之請而下，時在昭宗被殺、哀帝繼立的次月，包含著激發朝臣的忠君報國之意，號召四方諸侯同心協力以抗朱溫。時在襄州的忠義軍節度使趙匡凝有回應之舉，重修屈原廟，令麾下文人蕭振作《重修三閭廟記》^[37]。

不過，趙匡胤本人實乃借唐天子抗拒朱溫而發展自己的力量，其尊崇屈原而表彰忠君，不過政治手段而已。哀帝的封號旌表，在唐王朝大勢已去而諸侯爭權奪利之時，企圖以屈原的忠貞作道德的挽救，自是無力回天。這也是晚唐屈騷接受的尾聲。事隔三年，唐亡。

四

唐代屈騷接受的三個階段，每一階段都包括了屈原其人與其文這兩個接受向度，而閱讀者的反應各有其重心所在。初唐時期，太宗李世民為代表，以開國者的志向與氣度，一反歷來對屈原“怨刺其上”的指責，肯定屈原的諫君之過，要求在上者以屈原之死為鑒，保持清醒，自警有為。而王勃諸人對屈騷的批評在這一時期最具影響。他們以屈騷為靡麗文風之源而大加撻伐，其基點是文章乃“俗化資以興衰，家國由其輕重”（《上吏部裴侍郎啓》）的大事，強調文學的政治功用。因此，無論李世民的肯定也罷，王勃等的批評也罷，這一時期的屈騷接受具有鮮明的實用性，而落實在朝政與文風的建設上。中唐時期的屈騷接受深受中興復古思潮的影響，其讀者反應集中于屈騷文風的重新評價與批評屈原的處世方式。散文革新的先驅者如李華等對屈騷的批評，承繼了初唐時期王勃等的看法，而改以情感表達的“失中”、“不經”為批評的重點。韓愈和柳宗元則超出狹隘的文學社會功用觀，對屈騷的情感與文采做了全面的肯定。以白居易為代表的一批士人則以批評屈原的“獨醒”來撫慰在政治中興中受挫的熱情與忠心，調整自我，找回平靜。他們的批評雖然是針對屈原的處世方式，卻與李華等對屈原文章的批評有著潛在的聯繫，那就是對激情的不贊同。而屈騷的激情，恰恰是韓、柳肯定屈原及其文章的重要原因。因此，這一時期的屈騷接受，現象比較複雜，卻有內在的一致性，那就是重在屈騷的情感及其情感表達的評價。晚唐時期的屈騷接受以道德呼喚為中心，既具反思的色彩，如詠史懷古之作，又有鮮明的政治實用性，如批評時政之作，以及借屈原來號召忠君的朝廷舉措。由此看來，唐代三百年間的屈騷接受指向，除中唐時期注重的是其情感與形式外，初唐時期與晚唐時期都以道德為重而與現實政治發生直接的聯繫，呈現出一個由實用而返回實用的發展軌迹。

通觀這三個階段的發展，屈原與其作品的接受，由初唐時期的肯定其人而否定其文，到晚唐時期對人與文的全面肯定，中唐時期的屈騷接受是一大轉折，韓愈和柳宗元在其中具有關鍵性的作用。

就記載而言，漢人是屈騷傳播與接受的奠基者。漢人讚頌屈騷，有三大主題，一是表彰屈原的忠貞，二是同情屈原的不遇，三是強調楚辭的比興之義。他們的批評則集中在屈原的行為方式與屈騷情感的表達上，如揚雄之“何必湛身”說，班固之“露才揚己”說。而對於屈騷的鋪張揚麗，揚雄以“詩人之賦”標榜屈原，王逸則宣稱“《離騷》之文，依《詩》取興”，都強調屈原對《詩經》的繼承，以與宋玉的“辭人之賦”區別開來。在他們眼中，屈騷上承“風雅”，“有惻隱古詩之義”，而宋玉以下卻“競為侈麗闕衍之辭，沒其風諭之義”（《漢書·藝文志》），開靡麗文風之源。漢人的屈騷接受，無論是讚頌還是批評，都是以道德為指向。其三大讚頌主題，為後人所繼承發揚，他們對屈騷的批評，後世看法不一，而成為屈騷接受史上引人關注的問題。

魏晉以後人談屈騷，遠不象漢人那樣有道德熱情，因而對屈騷的情感與文辭多有肯定。如王敦言：“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世說新語·任誕》）影響至南朝，文人往往將屈原與宋玉并稱，謂其在《詩經》之後，開文士文學之先，風流瀟灑，直至齊梁。時風的讚揚者如此看，如沈約；時風的批評者也同樣認為，如裴子野。漢人對屈騷的批評，在魏晉南朝人則有相當程度的肯定，尤其是其侈麗文風，遂有屈宋并稱之事。南朝文人視屈騷為文士文學之源，而唐代的兩次文學革新，直

接的批判物正是南朝文風，故追溯根源，批評屈騷，責之為“澆源”。這兩次文學革新的提倡者，在文學觀念上都有比較濃厚的政治實用意識，他們表彰屈原忠君守國的品格，也以忠君守國的道德來衡量《離騷》等作品，故指其怨憤情感為“失中”，指其侈麗文辭是“不經”。

韓愈和柳宗元之肯定屈騷，不是基於道德立場，而是從文學自身性質出發。首先，韓柳論文，雖以“載道”為先，但非常重視文之所以為文的藝術性能。這一點，宋代的道學家們多有批評，如程頤說：“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卻倒學了。”^[38]朱熹批評韓愈“第一義是去學文字，第二義是去窮究道理”^[39]，“祇是要作好文章，令人稱賞而已”^[40]。這些批評恰恰說明，韓柳之重視博采前代文章精華，注重的是文章藝術，因而不同于前人以道德苛責屈騷，而盛稱屈原是“文章豪傑之士”。其次，韓柳都非常強調文學的抒發性，將詩賦創作視作士人抒愁娛悲的途徑。韓愈大力鼓吹“不平則鳴”，而曰“楚以屈原鳴”；柳宗元更是以屈原的知音自居，既稱“投迹山水地，放情詠《離騷》”^[41]，又代寫其怨憤：“呵星辰而驅詭怪兮，夫孰救於崩亡？何揮霍夫雷霆兮，苟為是之荒茫。耀娉辭之瞪朗兮，世果以是之為狂。哀餘衷之坎坎兮，獨蘊憤而增傷。”（《吊屈原文》）韓柳的自身遭遇，使他們對屈騷有著深深的情感共鳴，他們在古文運動中的思考，又從創作原理上申說了抒寫怨憤的合理性。因此，無論是屈騷的情感還是情感的表達方式，韓柳都給予熱情的肯定，取以為古文學習的精華。

韓愈、柳宗元對屈騷的充分肯定，基本上結束了唐代以屈騷為“澆源”的批評。李翱聲稱：“其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也。”^[42]皇甫湜說：“秦漢以來至今，文學之盛，莫如屈原、宋玉。”^[43]二人均是韓門弟子，如此推崇屈騷，可見師說影響。蔣防《汨羅廟記》曰：“三閭者，以大忠而揭大文，沈吟楚澤，哀鬱自贊，爰與褒貶，六經同風”，並將後世文人一概劃入其後學之列。蔣防也與李翱等一樣，以屈騷上承六經，而讚揚備致。晚唐陸龜蒙詩曰：“《離騷》既日月，《九辯》即列宿。卓哉悲秋辭，合在風雅右。”^[44]與徐介、裴說同一評價，用并位《詩經》來褒揚屈騷。中唐以前人談文學傳統，多以“風雅”為稱，而韓柳以後人，則多舉以“風騷”。故自韓柳褒獎屈騷，不僅消解了自漢以來的道德批評，更進一步深化了人們對屈騷的文學價值的認識。“風”“騷”同源之說，出現于南朝，而在這時才真正成為人們的共識。中唐的屈騷接受因為韓柳而成為古代屈騷接受史上最具有光彩的一頁。

註釋：

[1]《全唐文》卷10，P50中。

[2]《全唐文》卷141，P625上。

[3]《魏書》卷84，P1849。

[4]（唐）劉知幾撰（清）浦起龍釋：《史通通釋》，卷5，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4月第1版。

[5]《上吏部裴侍郎啓》，《全唐文》卷180，P806中。

[6]《王勃集序》，《全唐文》卷191，P851上。

[7]《駙馬都尉喬君集序》，《全唐文》卷166，P745上。

[8]《右拾遺陳子昂文集序》，《全唐文》卷238，P1061上。

[9]《詩格》是否出於王昌齡，姑且不論，《文鏡秘府論》中多有稱引，當是中唐流行之書，視為盛唐之作，當無大錯。

[10]《崔沔集序》，《全唐文》卷315，P1413上。

[11]《揚州功曹蕭穎士文集序》，《全唐文》卷315，P1413下。

[12]獨孤及《唐故殿中侍御史贈考功郎中蕭府君文章集錄序》，《全唐文》卷388，頁1744中。

[13]《全唐文》卷409，P1856上。

- [14]《全唐文》卷 527, P2372 上。
- [15]《全唐文》卷 538, P2418 下。
- [16]《答崔立之書》,《東雅堂昌黎集註》卷 16, 四庫全書本。
- [17]《柳河東集》卷 19,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
- [18]《上宰相書》,《東雅堂昌黎集註》卷 16。
- [19]《與楊京兆憑書》,《柳河東集》卷 30。
- [20]《答韋中立論師道書》,《柳河東集》卷 34。
- [21]《東雅堂昌黎集註》卷 12。
- [22]《柳河東集》卷 34。
- [23]《全唐詩》卷 531, P1343 中。
- [24]《全唐詩》卷 520, P1318 上。
- [25]《全唐詩》卷 523, P1326 上。
- [26]《全唐詩》卷 647, P1632 上。
- [27]《全唐詩》卷 602, P1527 下。
- [28]《全唐詩》卷 728, P1828 上。
- [29]《全唐詩》卷 524, P1330 中。
- [30]《全唐詩》卷 679, P1707 下。
- [31]《全唐文》卷 896, P4147 上。
- [32]《全唐詩》卷 470, P1192 下。
- [33]《全唐詩》卷 775, P1918 上。
- [34]《全唐詩》卷 720, P1812 中。
- [35]羅隱《經耒陽杜工部墓》,《全唐詩》卷 662, P1667 上。
- [36]見《全唐文》卷 93, 頁 425 下。另據《舊唐書》卷 20 下, 元佑二年六月, 馬殷修洞庭古祠而請哀帝賜名, 敕書曰: "三閩大夫祠, 先以澧朗觀察使雷滿奏, 已封昭靈侯, 宜依天佑元年九月二十九日敕處分。" 文中詔書時間, 據此而定。
- [37]見《全唐文》卷 869, P4034 上。
- [38]《二程語錄》卷 11。
- [39]《朱子語類》卷 137。
- [40]《滄州精舍論學者》,《晦庵集》卷 74。
- [41]《遊南亭夜還》,《柳河東集》卷 43。
- [42]《答朱載言書》,《全唐文》卷 635, P2840 上。
- [43]《答李生第二書》,《全唐文》卷 685, P3111 中。
- [44]《讀襄陽耆舊傳因作詩五百言寄皮襲美》,《全唐詩》卷 617。

參攷文獻:

1. 《全唐詩》,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縮印本。
2. 《全唐文》,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縮印本。
3. 《東雅堂昌黎集註》, 四庫全書本。
4. 《柳河東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